

光荣的人 光荣的事

貴州省民政厅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这本书，記載着我省十二个革命殘廢軍人和复員建設軍人的模范事迹。

革命殘廢軍人和复員建設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經受了各种艰苦环境和殘酷战斗的考驗，为人民革命事业流血流汗，立下过不可磨灭的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特别是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他們保持和发揚了革命傳統精神，干劲百倍，钻勁十足，涌现出无数的模范人物和创造发明。这一切說明，他們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积极分子，而且是建設大軍中最活跃的突击力量。

本书搜集的十二篇材料，是我省殘廢軍人和复員軍人无数模范事迹中的一部分。这些事迹，曾經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贊；把它选集成册，不仅为着广泛地表揚先进，而且也是广大讀者学习的光輝榜样。我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帮助下，全省殘廢軍人和复員建設軍人同志們，特别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們，一定会进一步鼓足干劲、再接再厉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美中不足的是，我們对书中模范人物的光輝事迹还体会不深，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作得不够，因此，沒能够將他們的英雄形象和事迹，特别是他們的思想活动，完整地描繪出来，这是要向这些同志表示歉意的。同时，书中的缺点和錯誤在所难免，更希望讀者来信指正。

貴州省民政厅1958年10月

目 录

失去双腿的英雄	(1)
不退色的紅旗	(6)
为民除害	(10)
党的馴服工具	(14)
征服标水洞	(15)
历險探水洞	(21)
保护生产的打獵队	(31)
“这算什么苦!”	(35)
一顆紅心	(37)
深洞里的炮声	(45)
“猛虎”造林突击队	(47)
擂台上的总台主	(54)

失去双腿的英雄

1955年的春天，在黔西县城至三重堰的山道上，走着一个双脚拐踏的人。他身穿一身半旧的黄军服，右手持着个弯柄拐杖，顽强地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人们都向这个陌生人投以敬佩的眼光。

他名叫田紹舟，解放前家里一贫如洗，四壁皆空，解放后才翻了身，分了地，安了家。1950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机砲連当机砲射手，在剿灭国民党頑匪时，不幸身负重伤，医院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忍痛将他的右腿和左脚割掉，从此他就是一个殘廢人了。他为此曾十分的伤感，有次心一横，就给自己初婚的妻子写了封信，说自己已是一个殘廢人了，为了不耽誤她的青春，他提議和她断絕关系。这封信发出前，被在一起疗养的袁营长看見了，袁营长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責备他不知道自己为人民負伤是如何的光荣，以及对新中国妇女的不信任，并告訴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不会把自己忘記的，就是殘廢也是有前途的；还給他讲了苏联“真正的人”季米席耶夫及其他革命英雄的故事，使他重新获得了生命力，鼓足了勇气，生活工作下去。

医生执行了自己的諾言，給他安上两只精巧的假腿，經過了一番艰苦的鍛炼，他已經可以持着拐杖慢慢地走动了，这更給了他奋斗的勇气。在1952年部队的文化学习运动中，他积极地参加了学习，由文盲提高到初小毕业水平。按照他的話說：“有一分力量，就出一分力量”。他决心回到家乡去，用自己的力量，来参加建設山区的神圣事业。部队的領導上滿足了他

的愿望，他就愉快地回到了久别的家乡——黔西县三重堰。

他爱人赵留华已经在区卫生站学接生，“家”连房子都没有一间，他牢牢地记住了临行前部队首长的教导：“不要给政府找麻烦，生活水平不要比群众高。”他把上级发的一百八十元生产资助金，用十五元买了块地基，一百多元买了木料砖瓦，盖了一座房子。他积极地参加了何大兴的互助组，并主动的为互助组买了一条黄牛。大家看他不能劳动，只让他在组里负责记工分。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每天都是很早就起床，给大家准备好劳动工具后，又忙着喊这个叫那个；还扶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跟大家一起到田里去。由于他不能参加体力劳动，只能在田坎上当“观众”。开始人们对这个残废人的行为，还有些奇怪，后来，也就慢慢的习以为常了。他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一拐一拐的到田里去，又一拐一拐的回家来。

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1955年的秋天，毛主席发表了“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在山区里展开了。田绍舟对自己的行为开始怀疑，认为自己简直连“小脚女人”都不如，思想也跟两条腿一样的残废了；不应当满足于自己那种跟着跑来跑去的当“观众”，要将自己全部力量，贡献给这个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从此以后，他一手拿着畚箕，一手扶着拐杖，到处跑着捡粪。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平凡的工作，但这对于一个用两只木棍来代替自己双腿的田绍舟同志，每捡到一堆粪，不知道要克服多少肉体和精神上的困难。他不声不响地从事这项“平凡的”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向合作社上交了二万斤人畜粪肥。

1956年的冬天，县里动员修筑黔西至金沙县的公路。在社



动员会上，有的人借口快过年了，不愿早出工，田紹舟首先报名参加第一批筑路劳动。社里许多人都尽力劝阻他，他还是坚持要去。在这种情况下，誰还甘愿落在这个殘廢人的后边呢？

当时正是十一月，在这黔西北的高寒地区，冬天来得特别早，田里的积水已結成了厚厚的冰块，泥土冻得比石头还要硬。田紹舟同志選擇了一个砸石子的工作，坐在山上迎着寒风捲来的冰雪，敲打着每块石头。

这样沉重的体力劳动，对他已經別了好多年了，他狠狠地捶着、捶着，第一天手上就磨出了血泡，但他还是不停地捶着、捶着。許多人都关心地跑来劝他休息，但看到他那副滲滿汗珠的面孔，也就摇摇头贊叹不已的走开了。

对于田紹舟來說，最困难的还不是砸石头的劳动本身，而是那一天几次的上坡下坡。中午，冰雪被太阳照化了，道路变成了泥河；下午又結成冰，大地就象鑲上了一层玻璃，連有脚有腿的人都免不了摔跤，何况他呢？

第四天的上午，乡长何定初来了，正顏厉色地要他回去，他虽再三声明他可以坚持，但总沒有用处；一种革命軍人服从命令的习惯，使他最后还是走下了工地。

这虽是短短的三天，但給了他很大的考驗，使他更多的相信自己——我一切都可以干！

去年栽秧的时候，他照例持着拐杖，一拐一拐的跟着到田里去，可是这次他有个新的打算：“下田去栽一栽”。走到田坎上，他偷偷的解下两只假腿，用褲腿把两截仅留的断腿包扎起来，一纵身下到了田里去，泥水齐到他的胸口，这一下可把大家吓坏了，一齐上去要把他拖出来。

“沒关系，我干得了，不信我們比賽比賽！”

“不行呀，这样会把你的伤搞坏的。”

“不是不让你干啊，只是我們看着你这样太可怜。”大家

七嘴八舌地劝解他。

他听了最后的这句话，脸忽然阴沉下来，怔了老半天，才咳嗽着嘴唇说：“这有什么可怜的？你们看见过打仗没有？几挺机关枪对着你，可是那时候，谁还想得起自己？只顾得一个劲往上冲呀冲呀，早一点把敌人消灭，少伤亡几个同志。前边的倒下了，后边的又冲上去；身上在流着血，还一个劲的往上冲，腿打断了，还咬着牙往上爬……你们一定说‘这太可怜了’。不，这不是可怜不可怜的问题，这就叫革命！牺牲自己，为了大家，栽几把秧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越说越激动，连脸都涨得通红。人们不由的松开了手。这时在人们眼前的不是一个露在水面仅有一尺多高的“残废者”，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不身临其境的人怎么能够想象得出他在深到齐胸的泥水里，是怎样的劳动的？他跪在泥水里，有时用两手支撑着身体，慢慢地爬行，可是一插起秧来，动作的熟练真象个老手。他身子敏捷的向后倒退着，一人横插五排，而别人最多的也只有四排，他还先栽到头。连一向被人称为快手的队长史树清，都被他远远甩在后边。他满身满脸都染满了泥污，可是却直着嗓子大叫：“劳动不要忘了娱乐呀！欢迎妇女同志唱个歌好不好？”

天忽然下起雨来了，大家要扶他去避雨，他哪里肯出去？还是照样坚持着栽秧。后来雨下得太大，田里的水越涨越高，他干脆坐到装粪用的木盆里。

当他完成了这一天的栽秧任务，从泥水里爬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裤子都被在水里的石砂划破了，两腿的伤处划得血淋淋的。他连忙遮掩起来，躲过了众人的眼睛，重新装上假腿，扶着那根弯柄拐杖，跟着这劳动大队一拐一拐的走回家里去。这一天的劳动并没有结束，晚上他打着电筒，又和大家一起到田里去扯秧子。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了三个整天。

去年冬天，合作社決定在安家坡挖一個五里長的引水溝，他又第一個報名。領導上知道攔阻是不行了，就背地給他說，“你去是可以的，但用不着干活，只到那里招呼一下就行了，冬天挖土不比夏天。”他嘴里是答应了，可是光会动嘴不捨得动手的人，他一向就是鄙視的，这次輪到他，那怎么能行呢？不过这次不是象修公路时坐在地上砸石子，也不象栽秧时跪在水里，而是要把全身立在两根假腿上，拿着鋤头在冻得象鋼似的硬地上挖土。他到底是个殘廢人，干一陣子就得坐下来休息一陣子；可是他半个小时的劳动，就足足頂得上別人一个小时。这一次他一直堅持了十三天。他参加劳动，一向都是白尽义务，从不社里給記工分，他說：“我的生活由国家照顧，参加义务劳动是应当的。”可是这次大家无论如何也要給記工分，大家說：“政府的章程，出一分力，要得一分报酬，你的成績比我們身体好的人都大，不記工分那能行？”好說歹說，十三天的活路，大家給他評了九十五个工分，当时上等的劳动力，一天最多的也只得到十一个工分。

从此，他再也沒有什么事不能干了。在爭取亩产双千斤的大跃进中，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多面手，虽然他还是照样持着那把弯柄拐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可是有誰还能說他是个殘廢了的人呢？

不退色的紅旗

楊礼平同志是独勝、左目失明、全身負有二十九处伤的二等甲級殘廢軍人。1952年复員回家后，由于自己勤學苦練，学会了农业生产上的各种本領，被群众公認為“全劳动力”：去

年一人得了一千五百个工分，今年已經得了一千八百个工分，正向三千二百个工分跃进。从1952年起，連年被評为乡、县兩級的革命殘廢軍人模范，兩次被評为省革命殘廢軍人模范，出席过省优撫模范會議二次。他是独山县殘廢、复員軍人的一面紅旗，現在正向全省殘廢、复員軍人、烈、軍属发起社会主义紅旗竞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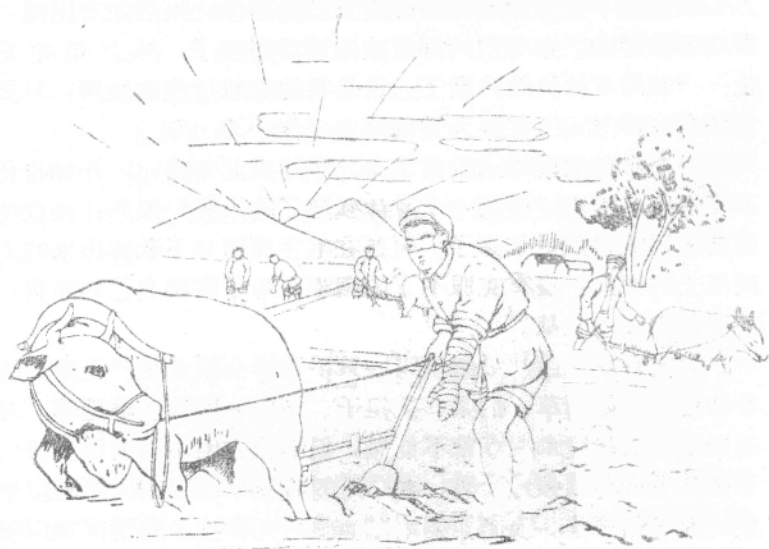
楊礼平是苗族，共产党员，現年四十二岁，出身在一个貧农的家里。解放前，生活过得很苦，也受尽了旧社会的各种折磨。参加了解放軍以后，在党的教育下階級觉悟提高很快。1947年5月在山东孟良崗战役負重伤。入黔后党照顾他，調他进荣校学习，繼又分配他工作；但他建設家乡心切，向上級要求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并向党表示：回家后当上劳动模范才写信回校。

当他回到久別十几年的家乡后，亲邻們看他是一个殘廢人，就劝他不要劳动了，多爱惜自己的身体，生活如有困难，群众帮助解决。亲邻們的好意被他婉言謝絕了，并且坚定地說：“我的身体虽然殘廢了，但是我的思想並沒有殘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定要为党的事业工作一天。”

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脫离了十几年的农业劳动，一开始也免不了有很多困难，何况一个身体殘廢了的人呢？因此，摆在他面前的困难也就更加多了。但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教育出来的人民战士的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为了实现自己的諾言，就开始向困难宣战。

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必须用一只手臂学会农业生产上所需的各种技能，如割草、捆柴、挑担子、犁田、薅秧、薅地等。对他來說，这些技术一点都不能做，但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呀！于是就下决心頑强地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人們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我們扼要地把他学习几种技术的情况加以叙述，就知道他是如何克服困难，忍受痛苦的了。

在学习割草时，开始用配的假手帮助压草，割了几下假手就掉了。以后他就用脚压草，因为不熟练，镰刀经常割脚，后来他就穿胶鞋去学。几个月，磨破了几双胶鞋和几条裤子才学会了。捆柴呢？用咀巴咬一头绳子，一只手拉另一头绳子，然后用脚踏柴，咀手往两头拉，捆起来的柴同两只手捆的一样紧。为了帮助军属犁田，他又学习犁田。最初选比较驯的牛带犁，一只手同时拿牛索和犁把，犁到转弯的地方就用脚拉牛索，牛自然就会转过来了。当人们得知他学会犁田的喜悦时又高兴又怀疑；一天，他正在犁田时，周围干活的人立即停止了干活去看他作犁田表演，在事实的面前人们不得不信服，并赞扬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他顽强地学习，很快就学会并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上的主要本领。大跃进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他更是干劲十足，事事



爭先。六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冒着大雨去抢水灌田，从下午干到深夜三点多鐘，终于把三亩多的干田灌得满满的才休息；另外他还培育二亩多丰产田，每亩施肥十万斤，薅三至四道，追五次肥，要亩产四千五，力争五千斤。在他的带动下，民兵、青年、妇女都普遍搞了丰产田。

楊礼平同志不仅在劳动生产上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同时在拥军优属、治安工作、教育复员军人、民兵等方面亦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的邻居是一家军属，母亲双目失明，家里只有一个媳妇劳动，儿子楊礼全是解放入伍的，这位老人时刻都在惦念着自己的儿子，有时想念得哭了起来。楊礼平察觉后，除了经常去安慰她外，在农忙的时候，还帮她家犁田、耙田，逢年过节还买些礼物去送；婆媳俩常去走亲戚，一去就是十几天才回来，他就主动去帮她家割草喂牛、喂猪，有时猪糠不够了，还用自已的钱买猪糠喂猪，几年来都坚持这样帮助军属。由于他关心军属，使这位老太太流下了感激的眼泪；从此，她不象过去那样想念自己的儿子了。

他回家后，常常以革命军人的高贵品质要求自己和教育复员军人和民兵，同时用自已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别人。有些复员军人如鄂荣先、鄂荣清、黎启云等回家后，游手好闲，不参加农业生产，常和干部吵鬧。他对这些人說：“我参军的时间比你们早，比你们久，年纪也比你们大，身体还残廢，按理說是应该休息了；但是我们要保持和发扬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努力。因此，我现在还积极劳动。你们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凭什么不劳动呢！”说得这些年青人哑口无言。目前这几个人在他的影响下有了转变，不但能安心农业劳动，而且在农业技术革新中有了创造，插上了红旗。此外，他还经常教育复员军人和民兵要提高警惕，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教给他们一些军事知

訊和破案方法。

楊禮平同志做出了一般身体健壯的人都难以做出的事迹，但是他并不驕傲自滿，处处表現了一个共產黨員应有的謙虛謹慎的品質。当同志們提到他的功績时，他虛心地說：“我没有什么功績，即使我有一点小成就，也应当归功于党和各級首长的教育。如沒有党和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工农就得不到解放，更談不到有今天了。”

我們从楊禮平同志的事迹中，得出这样一个結論：身体殘廢的人，只要思想不殘廢，有志气，有崇高的理想，有明确的方向，就会为党的事业做出貢獻。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的身体虽然殘廢了，但是我的思想並沒有殘廢，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为党的事业工作一天。”他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是党的优秀儿子，我們應該学习他高尚的品質和向困难作斗争的精神。

为 民 除 害

1956年4月27日，藍藍的天空，衬托着朵朵白云，邹习祥同志携着盛滿零星东西的网兜，冒着南风，奔走在崎嶇的通向婺川县栗园乡何家千寨的山路上，他的心象打鼓一样，咚咚地跳着，脸上带着一副笑容。是啊，今天就要和分別九年的父母、爱人、孩子重逢了，这怎么不使人高兴呢！爬上拔海大約二千公尺的高山，面前出現了一个平坝，在不远的地方有个寨子。他走近那寨子，便停了下来，好象在說：我被国民党抓走的时候，我家和許多貧农一样是破烂的茅屋，而現在都成了瓦房，我的家究竟住在哪里呢？正在发呆，迎面走来一个小姑

娘，她把他帶到一所才修建不久的瓦房前就喊。

“奶奶，我家來了個同志。”

全家都給這個突如其來的三十多歲的同志怔住了。老奶奶向前走了兩步，用半信半疑的眼光把這個小伙子從頭到腳，從腳到頭，反復打量了幾次才開口。

“你……你是不是習祥呀？”

“是呀，媽！”

這時，他媽由於過度興奮，眼里流出了熱淚，嘴巴張了幾張，沒有說出一個字來。他愛人雖然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也許是由於老人和哥嫂在場的緣故，沒有走攏去叫他，背着人在旁邊不停地擦着眼睛。

鄒習祥回家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一會，他家里里外外擠滿了人。你一言，他一語，問的鄒習祥真不知道回答哪個才好。忽然一個叫申茂儒的小伙子問道：

“你在朝鮮會打美國鬼子，你能不能打野豬呀？”

“當然能打！”接着他又反問：“你為哪樣問起這個來啦？”

這時，在鄒習祥面前站起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插嘴回答：

“我們這里的野豬可多啦，白天把包谷種上，晚上就給扒出來吃掉啦。大家沒有辦法，只好白天做活路，晚上把所有八、九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女組織起來，去追野豬，一個晚上只能睡半夜的覺，從種到收，這四、五個月的時間，天天晚上都是這樣。就是這樣，每年還得補種兩三次；這還不算，只我們這個六十七戶的社，還得叫野豬吃去八、九萬斤包谷。……”這其中的每一句話，都象鞭子一樣打在鄒習祥的身上。怎麼辦！打？既沒有經驗，又沒有槍。

後來，他東奔西走，野豬的活動規律，算是曉得了一點，槍也解決了。人，卻又成了個大問題，嘴唇都磨破了，還沒有一個肯參加打獸小組，這是為什麼呢？難道說，他們不希望把

野猪消灭了嗎？不，不是的，而是有顧慮。他們有的人說，野猪这样多，就是打死个把，能管啥用？还就攔活路。不如干脆少睡点覺，让它們吃点算啦。更多的人則是“怕”。他們說，帝国主义胆小，可野猪这东西不怕死，要是你一枪打不死它，它就会反扑过来，把你咬死。还是算了吧！打不好，咬几个人，事就不好办了。

邹习祥回到家，躺在床上，回想着碰到的这些問題：他們想消灭野猪，組織打吧？又都不愿参加，怕这怕那。当然，野猪不是好惹的，打这家伙，就是有生命的危險。是不是就瞪着两眼，叫野猪繼續吃庄稼呢？这时，他一翻身，胸前的朝鮮人民共和国授予他的两枚勳章，咣的撞击了一下，这使他立即想起了1952年9月的事：金日成首相，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的用中国話說：“听说你在开展冷枪运动的短短的时间里，消灭了九十七个美国鬼子，更使人兴奋的是你在三天內用二十七发子彈消灭了二十三个敌人，你真是个神枪手。我祝賀你，并且希望你获得更大的成績。”接着，首长在欢送复員軍人大会上的講話，也浮現在他的脑子里：“……复員軍人是鉄打的身子，鋼鑄的心。……你們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要勇于战胜困难；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回想起首长的囑咐，他又渾身是勁。

第二天，他又到处苦口婆心的去动员人，終算有四个民兵答应了“試試看”。

吃过早飯，五个人走出寨子不太远，分散搜索不久，傅崇福等一下就发现了十四个野猪，他們一看这么多，加上当时邹习祥沒有赶到，就沒开枪，便宜了它們。

跑了一天，沒有打到一个野猪。本来大家的情緒就不高，这一来，情緒就更低落了。打兽小組就这样垮了下来。

邹习祥站在小溪边，看着那漆树上象星星似的追野猪的

棚子，脑海里又展开了一场新的战斗：就这样散夥了嗎？在朝鮮，我一个人曾遇到三个比我高得多的拿卡宾枪的美国鬼子，結果还不是死在我手下！莫非說，一个人就不能和野猪較量一下嗎？

他背上枪，一个人上了山。衣服被挂破了，手上划滿了血口，他仍毫不在意的向前走着，在他通过森林之后，发现对面黄草坡上，有个比黄草还高的东西。他輕輕向那个方向走去。野猪听見了动静，七个野猪喉喉地撒腿就跑，邹习祥迅速地找了个隐蔽物，叭的一枪，一个二百三十八斤重的野猪立即不动了。他回家叫人把它抬回去，分着吃了。这对群众是个很大的鼓舞。經過說服，傅崇福等四个人又回到了打兽小組来。邹习祥一面教他們打枪，一面領導他們上山打野猪。在很短的时间內，使兽灾有了显著的減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乡的大力支持，猎手由五个增加到七、八个；由一个社普及到全乡。于是，轰轰烈烈的打野猪运动就形成了。在这个运动当中，邹习祥同志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样，大显身手，他又创造了二十四发子弹打死二十二个野猪的奇迹。現在，野猪已全部被消灭了。群众十分感激这些为他們除害的人，特别是邹习祥同志。因为他不仅在除兽害方面，出了很大力气，而且，社員們所以能够由缺粮到余粮；农业社由三类社跃为一类社，都与他这个社主任有很大关系。不論哪次区里、县里选模范复員軍人或者是生产模范，都少不了他。他現在担任着党支部書記，繼續辛勤地为群众工作着。

党的驯服工具

一个留分头、穿草绿色军装的二十九岁的复员退伍军人黄隆宝，正在读着北京日报社论“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当他读到党员“要做党的驯服的工具，而且要做积极性高、创造性大的工具”时，激动地说道：“说得对！说得对！”

报纸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而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行为也正是象报纸上所说的那样。

黄隆宝复员时，就抱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态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铜仁县瓦屋乡新民农业社。一放下行李，就参加生产。但是他干了三个月，刚把丢生了的农活搞熟以后，想不到社管会已决定让他去搞出纳。为了工作，他又拿起算盘、账簿，边做边学，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已能够按时公布账目了，工作得很顺利。可是，又过一段时间，上级布置了发展生猪的任务，社里决定办养猪场；党派他去担任养猪场场长。黄隆宝又愉快地承担了这个新的任务。

办养猪场是白手起家。黄隆宝和几个饲养员日日夜夜地工作，修猪圈，打猪草。逢赶场他就充当采购员，挑起箩筐上场买猪；场上买不到，下乡。一场增加四、五头猪。这时是冬天，女饲养员怕冷，不愿出去打猪草，他亲自带头干，并不断教育她们为社为国家着想。猪受冻，他把它扶到一边，烧火给它烤，煮熟饲料喂它，给它灌药。

艰难的冬天过去了，除一只猪因打架被咬死外，其余都长得很好。这时他作了个规划：养猪场要发展到五千头猪。他看过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他怀着向往的心情对饲养员说：